

中国近代的“鞍型期”与跨文化性（上）*

李雪涛

摘要：本文梳理了鸦片战争后六十年中国士大夫对“变局”的表述，以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的“鞍型期”为基本概念，认为与欧洲1750—1850/1870年间的转型期相对应的近代中国过渡时期，既是王尔敏从中国社会出发所认为的晚清六十年（1840—1900），也是张灏从中国思想出发所确定的甲午战争之后三十年（1895—1925）。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脱离与传统过于紧密联系的近代早期，形成了通向现代世界的转折阶段。原本不属于同一时代的近代早期与现代的一切相汇聚。文章还运用“跨文化性”与“文化互化”理论，认为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不再是同质性与单一性，而是异质性和混合性，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文化圈”及“文明的冲突”等理论进行了批判。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 “鞍型期” 文化圈 跨文化性 文化互化

历史转折点（Historische Zäsur）在历史思维中占有突出地位。然而，所谓的“转折点”并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其当时或事后的诠释。它服务于历史的主观秩序和对时间单位的划分。转折点的概念很难把握，它与所在领域以及不同视角有关。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区分后来的解释转折点与当时的经验或秩序转折点。

历史上那些重大的转折点决定着历史的走向，而时代的转折点却让我们对一切产生了怀疑。当中国历史进入19世纪40年代，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被一个不知名的远道而来的“蕞尔小国”所打

*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士大夫对时代的笃信骤然动摇，转而陷入对未来的深重不确定。

重大事件的发生可谓“时代的转折点”，就鸦片战争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当时很多士大夫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历史的转折点”尽管是历史连续体中的一道鲜明切口，但它遵循社会结构变迁的幅度，只有在此之后的历史学家才可能通过历史的比较和分析得出结论。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接触

罗马天主教宗教团体耶稣会（Societas Jesu, SJ）自16世纪建立以来，在东亚和南亚地区开展了长期的传教活动。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曾经是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的好友，也是耶稣会的共同创始人，他曾到过印度、马鲁古群岛和日本，最终于1552年在试图进入中国时去世。其后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并将欧洲古典、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和信仰传播到了中国。这些知识由于东亚知识间的环流，也被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日本和越南所接受。

1748年耶稣会传教士魏继晋（Florian Bahr, 1706—1771）编辑了《华夷译语》中的《额呀马尼雅语》（德汉词汇手册）。尽管这一词汇手册收录了20类的2017个词汇，但这些词汇大都是在明清之际固定下来的词语及其德译，并没有反映当时德国流行的表达上升时期的市民阶层在精神文化方面需求以及政治上诉求的词汇，当然不会有诸如Aufklärung（启蒙运动）、Bildung（教育、教养）、Brüderlichkeit（博爱）、Freiheit（自由）、Humanität（人性）、Kultur（文化）、Ideal（理想）、Menschlichkeit（人性）、Toleranz（宽容）、Weltbürger（世界公民）、

Wissenschaft（科学、学术）等新产生的词汇。^①况且这些启蒙运动的理念也是作为耶稣会传教士的魏继晋所反对的。^②

1793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 1737—1806）出使中国，第一次将外交触手伸向了北京朝廷。当时使团携带的礼品共有19项590余件，包括大型天体运行仪（Planetarium），以及天球仪、地球仪、空气真空泵、聚光大火镜、“君主号”战舰模型、毛瑟枪、连珠枪、钢刀、铜炮、榴弹炮等，都是当时欧洲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成果。^③1807年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抵达广州，这位被认为是新教在华传教事业之父的伦敦会（LMS）传教士，开始将欧洲近代知识和信仰传播到中国。

其实不论是马戛尔尼使团，还是马礼逊，他们来华所带来的知识与耶稣会时代的知识体系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是以实证的方式对以往理性知识的系统性整理。^④

但耶稣会、马戛尔尼使团抑或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极为有限的。举例来讲，尽管早在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之后，中国人已经见识过自鸣钟。17世纪，中国社会对这种新奇精致的小型机械非常感兴趣，到了18世纪以后很多贵族家庭也开始使用钟表计时，但当时钟表依然只是一种阔绰和地位的象征。成书于18世纪中期的《红楼梦》中“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就描写了刘姥姥第一次见到自鸣钟时的“惊愕”：

刘姥姥只听得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

① 参见〔德〕约阿希姆·希尔特（Joachim Schildt）《简明德语史》，袁杰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② 参见李雪涛《〈华夷译语〉丁种本与〈额呼马尼雅语〉之研究》，《中国文化》2021年春季号（总第53期）。

③ 参见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第241—322页。

④ 参见李雪涛《接续启蒙运动的知识传统——“贝克通识文库”中文版序》，载〔德〕安内马丽·彼珀《善与恶》（贝克通识文库），吕晓婷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23年。

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①

直到此时，西洋的时钟依然被视为“异国情调”（Exoticism）的摆设，并没有对中国的时间机制产生任何影响。一般来讲，欧洲钟表制造商以他们的钟表能够匀速运行，不受太阳周期的影响为傲，但在中国，同样的钟表必须被调整以适应传统的时辰——中国传统把一昼夜平分为十二个时辰，分别以地支为名称。由于时辰的长度取决于白昼的长短，因此在一年中会有所变化。因此在当时，这些机械钟表必须每天调整两次，并安装季节性的刻度盘，以抵消它对自然周期的独立性。因此，17世纪这种技术转移在中国基本上仍然是装饰性的，因为整体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并没有改变，不论是时钟还是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都仅仅起到点缀的作用而已。^②但到了184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被纳入了西方政治和经济轨道。西方的时间观念被视为所有改革项目的核心要素。新工厂及其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包括学校和军队在内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都需要一个新的时间制度。西方的钟表和钟楼成为现代的象征；守时和进步观念将西方时间转化为日常实践。也就是说，此时的钟表更多地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地缘政治条件的影响，成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日常实践的力量。^③换句话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所引起的“变局”，真正撕开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口子”，使其进入世界共同的“近代”进程。

① [清]曹雪芹、[清]高鹗：《红楼梦》（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② Li Xuetao, „Die Weltkarte des Matteo Ricci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Ostasien“, In *Acta Historica Leopoldina* 67 (2015), S.43-54.

③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69-70.

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士大夫对“变局”的认识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其他列强不希望英国独自坐大，纷纷步英国后尘，与中国签订条约。1844年，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同年，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法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1847年，瑞典、挪威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①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整个社会也逐渐从传统转向了近代。

1860年（咸丰十年）——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十年，举世瞩目的圆明园被毁，中英、中法签订《天津条约》，中俄签订《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让朝廷和士大夫感到无比屈辱，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经恭亲王奕訢等奏请，同年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一部分士大夫认识到了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遇到的新局面。他们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以图自强。历史学家王尔敏（Wang Erh-min, 1927—2024）认为，在这一阶段，在西方的势力冲击之下衍生了“变局”的观念：自1861—1900年间，“申述当前变局之意旨者不下37人”，“中国官绅之先知先觉者对变局的认识相当广泛，实已觉悟新时代的严重意义”^②。

中国士大夫意识到“变局”的到来，基本上是在鸦片战争到义和团

① 即1847年3月20日清政府与瑞典、挪威等国在广州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

② 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12页。

运动整个一甲子中的后四十年，在1860年前仅有黄钧宰和曾国藩有一种意识，认为中国要经历一场前所未有之“变局”。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很多士绅开始意识到西方人进入中国的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形成的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利用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开展挽救清朝统治的“自强运动”。同时这场战争也促使中国开始关注海洋防卫的重要性，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而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有关“变局”的论述在中国士大夫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圈子中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

19世纪40—90年代有关“变局”说法一览表

序号	提出人	说法	提出年代	出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1840—1860）				
1	黄钧宰（1826—1895）	变局	1844	《金壶七墨》
2	曾国藩（1811—1872）	奇变	1854	《讨粤匪檄》
洋务运动时期（1860—1880）				
3	黄恩彤（1801—1883）	大变动	1865	《抚远记略》
4-1	丁日昌（1823—1882）	实开千古未创之局	1867	《奏陈自强之道》
4-2		大变	1875	《海防条议》
5-1	王 韬（1828—1897）	创事	约1870	《答强弱论》
5-2		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	1876	《变法自强下》
6-1	李鸿章（1823—1901）	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2	《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6-2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874	《筹议海防折》
7	薛福成（1838—1894）	变局	1875	《应诏陈言疏》
8	曾纪泽（1839—1890）	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	1878	《〈文法举隅〉序》
19世纪最后二十年（1880—1900）				
9	黎庶昌（1837—1898）	大变端	1884	《敬陈管见折》
10-1	郑观应（1842—1922）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1894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
10-2		千古未有之变局	1894	《盛世危言·水师》

生活在清中后期的黄钧宰，是目前所知最早用“变局”来描述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形势的文人。1844年秋，他出版了著名的笔记《金壶七墨》，记游幕期间之亲见亲闻，保存了一些有关鸦片战争的珍贵史料。书中写道：

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颺，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①

黄钧宰在此忧心忡忡地指出了英法觊觎中国的企图，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变局的开端：从以往的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一家”之世界。

1854年，作为晚清名臣的曾国藩指出：

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痛哭于九原。^②

此时的曾国藩依然是从中国文化的没落着手，表达出在“奇变”中对中华文明未来的担忧。

黄恩彤是《南京条约》的主要签订人之一，1845年升任广东巡抚。他最早将此种情况称作“大变动”（1865）：

迨英吉利互市开关，粗就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洵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也。^③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623—624页。

② [清]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79页。

③ 黄恩彤：《抚远记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409页。

黄恩彤之后还曾参与签订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的谈判，因此在他的论述中更多地是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大变局”。

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以后，中国整个的士绅阶层开始对“变局”产生了共识。作为洋务运动的实干家和风云人物的丁日昌在《奏陈自强之道》（1867）中称之为“实开千古未创之局”：

要当灌溉先勤，方可望有秋之日。若我以得过且过为安，则彼必为得步进步之计。则为货岂有艾哉！一坚持定见，以法令齐人心之不齐。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见其利，而且身受其害。当事者奈何斤斤为一身之利害毁誉计，不远通上下之情，而变循之习乎。^①

丁日昌在奏章中对西方在机械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后来也为江南制造局专门拟订了经营大纲。除了“开千古未创之局”的说法外，1875年丁日昌在上奏中还写道：“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家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②可见，现代军事和体制改革对于他来讲是极其急迫的一件事。

王韬曾在上海的墨海书馆工作，后逃亡至香港。其后，他又游历欧洲，曾到牛津大学演讲。1874年，王韬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他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发表了八百余篇政论。早在1870年初，王韬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变局称作“创事”。^③他的《答强弱论》一文在《香港近事编录》上发表的时候，他还在苏格

① 《附呈藩司丁日昌条说》，载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69页。

② [清]丁日昌：《海防条议》，载葛士澐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第101卷，上海：文盛书局，1898年，第23页。

③ 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史事考辨》，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

兰协助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翻译中国典籍。他在文章中写道：

合地球东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此岂出于人意所及料哉！天心为之也。^①

作为当时的著名报人，王韬是近代中国“变局”论的最早倡言者之一。他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在其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1876）中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十八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二十三年。王韬在《变法自强下》中写道：

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我中朝素严海禁，闭关自守，不勤远略，海外诸国至中华而贡献者，来斯受之而已，未尝远至其地也。以故天下有事，其危常系西北，而不重东南。^②

在王韬看来，中国今天的威胁跟以往不同：并非来自传统的西北，而是来自中国的东南沿海——源自海上的西方强国的入侵。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得使用传统兵器的中国根本无法防御。李鸿章在1872年的奏折中进一步声称：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

① 王韬：《答强弱论》，《菉园文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页。

② 王韬：《变法自强下》，《菉园文录外编》，第40页。

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①

自此，“变局”成为后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说法。李鸿章让同治皇帝意识到中国要参与到这一“变局”之中。1874年李鸿章在《上奏清廷折（论列强之侵略本质）》中继续写道：

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②

李鸿章认为，鸦片战争后，西方人从东南沿海来到中国，在中国传教，或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他们的“轮船电报之速”以及“军器机事之精”是中国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之匹敌的。正因为西方列强的侵入方式与手段前所未有的，李鸿章认为，中国已无法依赖以往经验来理解和应对这一局势。

薛福成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早年曾栖身曾国藩的幕府。他在1875年（光绪元年）的《应诏陈言疏》中写道：

自古边塞之防，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彼又设馆京

①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册“奏议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②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6册“奏议六”，第159—160页。

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①

薛福成的“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都是在这份万言书中，经丁宝桢转呈李鸿章的。李鸿章立即延请薛福成加入幕府，成为北洋通商大臣的智囊人物，给直隶总督出谋划策。薛福成在“陈言疏”中，不仅认为西方科技发达，也指出西人智勇狡诈的性格，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运会”——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自然势力，在不可预期的机会中到临，并由此带来天地人群事物等巨大转变。魏源（1794—1857）和徐继畲（1795—1873）也都认为，中西交往的关系，正是一个新的“运会”的开始。^②当时大部分的士大夫依据八卦方位理论理所当然地认为，天地之气是从处于西北“乾”处的西方世界开始，逐渐向东南运转。根据五行的性质，西方属金，因此他们擅长金属机械制造与器物的发明创造。

曾国藩次子曾纪泽（1839—1890），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位驻外公使，与郭嵩焘并称“郭曾”。由于曾纪泽颇有见识，他当时被誉为“学贯中西”。1878年（光绪四年），曾纪泽在出使英法之前，曾为朋友汪凤藻（1851—1918）《文法举隅》（1880）一书作序，序文中说：

上古之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③

① 薛福成：《应诏陈言疏》，《庸庵笔记》卷一，光绪十三年（1887）无锡薛氏传经楼家刻本，第19页。另见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6页。

② 魏源认为：“岂天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海国图志后叙》，《海国图志》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21年，第8页）而徐继畲指出：“欧罗巴一土，以罗经视之，在乾戌方，独得金气。”（《瀛寰志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另参见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③ 曾纪泽：《〈文法举隅〉序》，《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35页。

曾纪泽的“创局”观念，让当时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开始以一种近代观念审视中华文明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所面临的时代危机。

而曾担任曾国藩幕僚的黎庶昌在驻日本使署期间，撰写《敬陈管见折》（1884），称当时的变局为“大变端”。黎庶昌提出了军事、经济、外交方面的六项改革措施。他在奏折中指出：“中西交涉，为古今一大变端，所贵审度彼己，择善而从，庶不至扞格增患。”^①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西方真正进入了一个“中西交涉”的阶段。这其实正是梁启超所谓“世界之中国”的一个标志。^②

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要数郑观应了，他在澳门隐居近六年的时间，在其所撰的《盛世危言》（1894年，光绪二十年）一书中，他提到他所处的时代正经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古今崇论闳议，如煌煌经史，列朝名人奏议及近人经世文编，皆高文典册，治国良谟，奚俊鄙人饶舌。惟今昔殊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君相同德，上下一心，亟宜善承其变而通之，仿泰西，复三代之法，广开民智，以御外侮。^③

郑观应开始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化。他认为，以往中国人谈论历史仅仅局限在中国历史之中，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海禁大开之后，中国人才发现自己的文化只是世界文明之一，并且欧洲各国的

① 黎庶昌：《敬陈管见折》，《拙尊园丛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378页。

② “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是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中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三个时代。“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汤志钧、汤仁译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0页）意思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在梁启超看来，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实际上标志着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开端。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盛世危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文化虽比中国起步晚，在科技、政治等方面却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他还认为，西方的议院制与中国三代之法度相符，主张“仿泰西，复三代之法”，以“化西为中”的手法吸收西方文化，使中国文化得到提升和完善，最终以王道宾服天下。此外，具体到海防方面，郑观应指出：

中国海疆袤延万余里，泰西各国兵船飘驰，轮转络绎往来，无事则探测我险易，有事则窥伺我藩篱，从此海防遂开千古未有之变局。居今日而筹水师诚急务矣。顾其中纲领约有五端：曰轮船、曰火器、曰海道、曰水营、曰将才。^①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建立一支真正的海军，必须注意发展军舰与兵器，熟悉敌我水道、建设海军基地、培养海军将官等等。以前中国的边防主要在西北，因此在郑观应看来，从海防入手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是“开千古未有之变局”，从而使国家不再备受列强所欺凌。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全面检讨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认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彻底变革，必须触及中国的政治、司法、教育、经济、言论自由等各个方面，必须政治公开化，朝野互动，方能使政治措施日臻完善。

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形成的体系化的知识，也通过各种方式被译介到了中国。19世纪60—70年代，同文馆直接采用西方的各种教材，而江南制造局则翻译了大量西方在理工科方面的教科书。有关国际关系的知识，也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中国。西方列强维持国际和平的方式与策略，给予了中国外交思想很大的启发，同时也使中国官绅认识到了所谓的“均势主义”。1878年，马建忠（1845—1900）在《适可斋记言》（1878）卷二专门介绍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范斯法尼之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盛世危言》，第27页。

会)，提出“均势之说”。^①马建忠并且建议说，西方国家之间的联合与结盟，是办理外交上最有效的策略。“马氏的言论，已很清楚地移植了现在西方的均势主义与联合结盟政策。而马氏为李鸿章之僚属，李氏外交政策受马氏影响甚大。同时代人中，如郑观应主张联美，张焕纶主张联英，均反映出吸收结盟政策的外交思想。”^②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士大夫也已经逐渐从原有的“朝贡体系”，转向了新型的国际关系。

总体来讲，变局的观念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到了19世纪60—80年代，已经成为了当时士绅阶层的普遍共识：中西文化交汇的大势已定。王炳燮（1822—1879）所指出的“当今天下，实千古一大机括”^③，是千百年来一直固守着孔孟之道的乡村绅士们不可能预料到的时代变局。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黎庶昌、郑观应等已经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对千古变局的共识。

晚清发生在中国的“变局”，完全不同于之前历朝历代朝廷的更迭。不论是宋元之变，还是明清递嬗之际，士大夫阶层依然可以依靠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和知识，顺利化解这些变化。但发生在晚清的这次“变局”，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环境之变化，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情形，与西洋人之交涉又远非以往的经验所能覆盖。为了应对这种

① “夫均势之说，创于范斯法尼之会，然而与会者不过法、奥、瑞典、西班牙暨日耳曼之属。而普因北教而屏，英以异教而斥，故其相维之势，足以联络数国，不足以统属欧洲也。至迂特来之会，英、普与焉，而俄国不与，是均势之盟未尽善也。且范斯法尼之会，诸国虽共订条章，而西班牙与荷兰另有孟斯德之约；日耳曼王率属邦先与瑞典有奥斯纳勃卢克之约，继与法国复有孟斯德之约；法国与西班牙又有比来纳山之约。前后纷纭，而统谓之范斯法尼之约。又迂特来之会，英人先与法王盟，继与西班牙王盟，复与他国王分盟。然则是二会者，只属数国之私盟，而非列邦之公约。夫会者所以结同盟之信，盟之者众，则信益彰，而守愈笃。今此二会，散漫无纪，不能共相维持，宜其不久而各国弃髦之也。维也纳之会则不然，俄国与约而均势之道公，友邦共盟而要结之谊固。”（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63—164页）

② 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2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影印本）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31页。

“变局”，当时的士大夫调动了所有的“中国知识”，法相唯实宗的理论也被章太炎（1869—1936）、熊十力（1885—1968）、张君勱（1887—1969）、梁漱溟（1893—1988）等清末民初知识分子重新推崇，除了将之作为一种应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方式，也将它运用到具体的整理国故之中。

三、“时代门槛”与“鞍型期”

1450年至1850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的近代，正是在这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全球变革。跟以往相比，生活方式、经济运作、统治方式，以及知识秩序、传播媒介的基础和人们的宇宙观与自我认知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欧洲通过探险接触了未知的世界，了解了新的文化，培育了诸如马铃薯和可可等新的农产品。当时的占星学和神秘主义与其他自然哲学一起，为现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传单和报纸等新型媒体影响了宗教和政治运动的传播。社会规范，例如对男女角色的理解，也发生了转变。

近代经历了两次的转换：其一是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转换的“时代门槛”，其二是从近代早期到近代转换的“鞍型期”。

（一）“时代门槛”

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布卢门贝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将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转变称为“时代门槛”（Epochenschwellen），用于描述两个纪元之间的时间段。布卢门贝格将“时代门槛”描述为“潜移默化的界墙”（unmerklicher Limes），只有回顾后（事后）才能被认出。这一合成词中的“门槛”以隐喻的方式表示“时间段”或“阶段”。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另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布卢门贝格认为，两个时代之间有一个门槛（Schwelle）：

新时代没有目击者。新时代和旧时代的转折是一个无人察觉的界限，与任何明确的日期或事件都没有明显联系。但是，经过差异化的考察，可以勾勒出一个门槛，确定它尚未达到或早已跨越。^①

我们如何划分历史？在个人生活中，通常很容易找出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是开始新的工作、结识新的伴侣，还是命运的转折，都预示着：人生的一个阶段结束，新的阶段开始。但是，如何确认新时代已经开始？是否有鲜明的界限、明显的动荡或逐渐凸显的门槛来标志着从一个时代到下一个时代的转变？布卢门贝格在他的著作《近代的合法性》中，以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为基础，分析了划时代转折点的现象。他的思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近代早期。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的见证者是否能对自己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做出判断，还是只能在事后回顾时才能看到？^②

布卢门贝格认为，要确定一个发生划时代变革的时间点是不可能的。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辨别逐渐消失的世界观，或者通过确认一种本质上是全新的思维方式，来推测发生划时代变革的时间段。这就需要研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思想家的著作：布卢门贝格选择了中世纪的库萨努斯（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和已经进入近代早期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布卢门贝格认为，库萨努斯对中世纪表现出一种“关怀”，他试图通过坚持哲学洞见来“拯救”中世纪的整体世界观，而这些洞见却正推动着他对中世纪世界观的解构。布鲁诺的思想世界则展示了神学不稳定性的一面——这其实已经进入了近代学术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其中展示了中世纪与近代早期之间的历史转折点上相互矛盾的方面。尽管这两位哲学家仅相差

^① Hans Blumenberg, *Aspekte der Epochenschwelle: Cusaner und Nolan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3), S.20.

^② Hans Blumenberg, *Die Legitimität der Neu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6; Neuausgabe ebd. 1996).

一个多世纪，在他们中间却横亘着一个时代的门槛，其中一个人感受到了威胁性的上升，而另一个人则认为已经超越了低谷。然而，对于布卢门贝格来说，划时代的变革并不等同于历史进步。每个时代都有其内在的存在合理性。古代人并不在任何方面都比中世纪人“更差”。历史不是线性接近真理的过程。它是一场不断寻求方向、意义和自我肯定的斗争。在身份政治代际冲突的时代，这种对历史的思考可以起到缓和作用：心态的转变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无论对其进行怎样的道德评价，传统的世界观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虽然“转换”的概念不能使时代门槛本身变得可见，它却能更准确地描述出称得上“新时代”的必要条件。^①人们跨越了一个门槛，但并非站在它上面。“时代门槛”的概念所要强调的重点不在于门槛本身，而在于跨越的过程。

（二）“鞍型期”

20世纪7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提出了“鞍型期”（Sattelzeit）的概念，用于描述近代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时期。^②他认为，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必然存在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过渡期。^③ Sattel一词在德文中是“马鞍”的意思，其引申的含义是马鞍形山脊，或两峰之间的山口，代表逐渐过渡。

① Hans Blumenberg, *Aspekte der Epochenschwelle: Cusaner und Nolaner*.

② “鞍型期”理论是科泽勒克在其主编的8卷本大词典《历史学基本概念——德意志政治、社会语言历史学词典》的“导论”中提出的。Cf. mit Werner Conze und Otto Brunner,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8 in 9 Bänden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1997; zuletzt: 2004).

③ 以研究冷战而著称的德国当代历史学家姆罗泽克（Bodo Mrozek, 1968-）认为，科泽勒克多次强烈反对自己的术语，他自己说这个词只是“偶然”创造的，“为了赚钱”，并且“在理论上非常薄弱”。（Bodo Mrozek, „Die sogenannte Sattelzeit. Reinhart Kosellecks Geschichtsmetapher im Erfahrungsraum des Krieges,“ in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 und Geistesgeschichte* 75 (2023) 2, S.139 f.）即便科泽勒克在“公开反思自己在纳粹战争中的角色”的时候，也没有承认自己的术语源自“纳粹主义的骑术”。（Ibid, S.133）瑞士伯尔尼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艾巴赫（Joachim Eibach, 1960-）在概念领域中看到了两峰之间的山口，认为“鞍型期”仍然是一个有趣的“启发式提议”。Joachim Eibach, „Die Sattelzeit: Epoche des Übergangs und Gründungsgeschichte der Moderne,“ in *Europa und die Welt. Studien zur Frühen Neuzeit*, hg. v. R. Charlier, S. Trakulhun und B. Wehinger (Potsdam: Wehrhahn Verlag 2019), S.148.

Sattelzeit 在汉语中被译作“鞍型期”，它除了表示一个过渡时期外，还在强调其重要性。

科泽勒克认为，启蒙运动的晚期以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时期，大约在1750年至1850年（或1870年）之间，这是西方从近代早期走向近代的分水岭，旧世界不断解体而新世界随之兴起，因此这一时期对政治体系和概念结构来说都至关重要。社会政治动荡使得欧洲社会、人的气质和日常生活向现代转向，现代性政治思想的关键术语经历了含义的深刻变化，例如“国家”（Staat）、“公民”（Bürger）、“家庭”（Familie）；一些现代价值观也是在那个时期首次提出，并作为典范流传后世的，如“帝国主义”（Imperialismus）、“共产主义”（Kommunismus）、“阶级”（Klasse）。正是在这一时期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西方世界：现代人和现代西方。在这一百年之中，基本概念在此之前受传统“经验”的束缚而语义稳定，而在此之后则受未来导向的指引，形成影响至今的语义形态。在这期间，基础概念散落在各领域的语义不够清晰，并且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传统经验和未来期待的语义成分相互冲突、碰撞，同时也交织在一起。根据科泽勒克的观点，意义转变是指随着历史经验的变化，历史发展被强调为一种新的变化和运动，政治核心概念的含义也从永恒、静态的意义转变为面向未来的具有前瞻性的内容。他希望通过这些基本概念的语义及其结构性变迁来感知人类观念与行为的变化。

科泽勒克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和“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两个维度，前者是过去的历史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史实，后者则是人们对未来的期待，而处于“鞍型期”的人则恰恰在二者之间徘徊——因为当下既是以往事实的结果，同时也是未来期待的起点，他们同时要面对过去和未来的断裂和联系。^①在

① Reinhart Koselleck, „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 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 in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95) S.349-375.

“鞍型期”中，对未来有目的的期待与过去的历史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因此，在科泽勒克看来，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与近代早期的人士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会将政治现状的道德评价，对进步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历史终极目的的末世论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来看待，这便产生了将眼光投向未来乌托邦的想法。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科泽勒克认为，历史地看，启蒙以后的过去就是未来。^①

在《历史学基本概念——德意志政治、社会语言历史学词典》的导论中，科泽勒克指出词典的整体目标是：“主导问题意识（leitende Fragestellung）是通过它们的概念框架的历史来研究旧世界是如何解体 and 近代是如何兴起的。”^②

科泽勒克将所选概念描述为“历史运动的主导概念”，^③它们作为“要因”（Faktor）和“指标”（Indikator）同时记录和影响了向现代世界的过渡：对于概念史而言，语言一方面是所遇见“现实”的指标，另一方面也是这种现实发现的一个要因。^④他还认为，向现代世界的过渡将通过四个假设来予以描述和分析，它们涉及在“鞍型期”中基本社会和政治概念的含义、地位和使用方式是如何变化的。

第一个假设的表征为概念的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它所指的是概念不再仅由精英（贵族、律师和学者）使用，而是在

①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der frühen Neuzeit,“ in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S.17-37.

② Reinhart Koselleck, “Vorwort,“ 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I* (Stuttgart 1972), p. XIV.

③ *Ibid.*, XIII.

④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 2006) S.99. 陈建守将这两个概念分别译作“要素”和“指标”，参见陈建守《语言转向与社会史：科泽勒克及其概念史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第193页。方维规将这两个概念译作了“因素”和“表征”，参见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176—180页。日本学者福本義憲将这两个概念译作“要因”和“指标”，参见福本義憲「テキスト・ディスクリス・ディスクリス分析」，《首都大学東京・東京都立大学・人文学報》第405號（2008年3月），103頁。

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得到了传播。第二个假设标记为概念的时间化（*Verzeitlichung*）：它所指的是政治和社会变革不再通过重复和循环的模式，而是通过对未来的关注以及对变革和进步的期望来解释，以及概念在此过程中围绕历史哲学思想——即作为一个统一和进步的运动，按照一个固定的计划向最终的社会政治目标和意义前进。第三个假设标记为概念的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ung*）：它所指的是概念抽象程度的增加使它们能够根据各种团体和运动的利益、目标和期望得到利用。最后，第四个假设标记为概念的政治化（*Politisierung*）：它所指的是被动员的人数增加，导致概念在制定政治和社会立场时作为口号的使用增加。

科泽勒克通过“历史”（*Geschichte*）逐渐为“史学”（*Historie*）的概念所取代的变化，指出由于新的历史概念是一种包含所有历史的建构，既被称为客体，也被称为主体，因此不再有复数历史，而只有单数历史的说法——“历史”（*Die Geschichte*）。因此，科泽勒克将这种概念形式称为“复合单数”（*Kollektivsingular*）。“历史”这一充满意识形态的“复合单数”已经在1780年成型；此前的“历史”概念虽未消逝，但在18世纪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历史总和”与“历史反思”，它连接经验和期待，与以往的历史并没有太多的关联。^①

作为对科泽勒克概念史观念的补充和扩展，近代史研究学者认为“鞍型期”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变化，这使得其与现代化理论的假设更为接近。这些特征包括：人口结构变化、从等级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变革、通过新的交通工具（如铁路、蒸汽船）的交通革命、工业化的开端、新的文化和消费形式的形成，等等。

不论是“鞍型期”还是“时代门槛”，我们都应当从过去250年历

^① Reinhart Koselleck, „Geschichte, Historie,“ 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2*, (Stuttgart: Klett Cotta, 1975), S.593-717.

史观念变迁的角度来予以把握。在这种变迁中，新的历史经验和对生活世界的期待凝聚为对历史处理方式的哲学前提的变革。讨论的核心将是历史主义，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思考方式，至20世纪一直深刻影响了人文学科。